

宗教哲學家的風範

賴景瑚

謝扶雅教授講學台灣的印象和期望

謝扶雅教授是蜚聲中外文壇的名作家。若干年來，他為反共復國而大聲疾呼；我們在美國及台、港各地的報章雜誌上，經常看見他那許多慷慨激昂的文章和熱情洋溢的詩詞。不識謝氏的人，總以為他是血氣方剛的愛國志士，決不會想到他是年臻耄耋，學貫中西的宗教哲學家。我在一九二六年就和他在芝加哥見過面；近年由於同寓美國東岸，又得常相過從，因而對他有更深切的認識。

今年春天，他應台灣幾個大學的邀請，返國講學。他跋涉萬里，視聽又不太方便，飛抵台北之日，就已疲憊不堪。但他席不暇暖的走遍全島設有哲學科系的大專學校，因為他覺得他負有和年輕人探討人生哲學和生命意義的時代使命。同時，他也深信我們要救中國、救世界，一定要從思想哲學的根本着手。他在東海大學宗教文化討論會兩次演講的主題，便是要把中國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結合，蔚為一種最完善、最美好的新文明。

他過去曾執教於中山大學及嶺南大學，戰時又在湖南教過書，並主持過藍田國立師範學院。

他一向和青年最接近，也喜歡循循善誘的引導他們研討哲學和宗教。這正是他今天還能精神充沛，老當益壯的一個原因。他常對我說：「他最怕今日青年過度崇拜西方的物質文明，而忘記了自己文化傳統。他覺得五四運動雖對文學革命及新思潮的推進有很大的貢獻；但那時一般青年的心浮意躁，和三〇及四〇年代的盲目左傾，乃致造成今日中國的大災難。」

扶雅兄這次回國，很高興的發現自由中國的青年，和他以前在大陸及香港所遇見的，大不相同。他在各大學講學的時候，他看見學生無不精神貫注的聽講；講後討論，又無不爭先恐後的發言；甚至班上發言嫌不够，還有不少人單獨到他住處，提出許多有意義，有深度的問題和他研討。他覺得學校裏青年追求真理的熱忱，和社會上學術空氣的濃厚，實在是台灣最值得重視的好現象。他也對自由中國的青年，具有極大的信心和希望。

他說：「這一代的中國青年所負的時代使命，既偉大而又艱鉅；因為我們正面對着歷史上空前的兩個大問題。一個是祖國山河的破碎和分裂；一個是外來力量的衝擊及滲透。我們深信總有一天會把中共政權推翻，神州大陸光復的。可是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如何去負起建設一個新中國和它文化的責任呢？這便不能不期望於自由中國和它所領導的有為有守的青年了。他那種苦口婆心的講演，並不是說教式的佈道，而是語重心長的至理名言。」

扶雅兄是哲學家，而以研究神學名聞海內外。我近年常讀他的詩文，也知道他文思敏捷，斐然成章。近年他在美國的流亡生活中，完成了基督教歷代名著集刊三十二卷，每卷四十萬字。連同他前後發表的學術論文及對時局的意見，他至少寫了兩千萬字以上的書刊。他現在快要九十歲了，還是孜孜矻矻，手不釋卷；還是每天揮筆不停，不是吟詩，就是寫文章。誰都不能不佩服他的精力過人，和他那種永不服老的氣概。

他送給我和內子一部他一九二七年發表，此次在台印行三版的「宗教哲學」。他的宗教哲學的定義，就是簡單明瞭的「宗教之哲學的研究」。他說：「宗教不是哲學，但從哲學的立場，研究及批判人生宗教的活動，包括宗教思想、宗教意

識及宗教行為，這便是宗教哲學。宗教哲學的任務，他認為可以分為三步：第一步蒐集及選擇宗教事實或資料；第二步分析及類別上項事實；第三步從上項事實中，歸納根本原理，而推論宗教之意義與價值。

照他的解釋，第二步是宗教哲學的手段，第三步從上項事實中，歸納根本原理，而推論宗教之意義與價值。宗教哲學便可以說是闡明宗教之意義與價值的學問。他認為宗教存在於歷史上，也存在於社會上，實在就是一種人生活動，而人生活動何者為宗教的，何者為非宗教的，必先分辨清楚。



本文作者（左）與謝扶雅教授（中）余井塘資政（右）合影。

扶雅兄這次台灣之行，又帶來了半世紀前他在上海敘書的一段佳話。那就是有關謝東閔先生的少年經歷。那時他正以一台灣的熱血青年，因反抗日本而投奔祖國；他在上海舉目無親，彷徨失助的時候，扶雅兄邂逅相逢，立即援之以手，使東閔兄前後進入東吳大學及中山大學，完成了學業，復加入了抗日救國的行列。現在東閔兄貴為自由中國的副座，當然以上賓之禮接待他在患難中的知音扶雅兄。我不但參加了他的盛宴，而且以同為兩位謝先生的老友為榮。

我在台北一位好學不倦而又以詩人聞名的好友余井塘兄，常常聽見我說起扶雅兄，而沒有和他見過面。這次他翩然蒞台講學，我在寓所以便餐款待，特邀井塘兄作陪。兩老一見如故。扶雅兄詩興勃發，立贈一絕。從此兩老唱和不斷，我便成為兩老的傳遞人。我亦以「附庸風雅」為樂。

楚，所以，他就依次研討宗教與他種人生活動的關係：一、與「知」的活動。二、與「美」的活動，三、與「道德」的活動。換句話說：這便是闡釋詳明的著作；雖然不能說已窺透人生和宇宙的奧義，但可以說是得了一點宗教哲學的初步認識。他講話的紹興口音很沉重，初次和他交談的人很不易聽懂。但他有多年教學的經驗，總把許多精微玄妙的哲理，深入淺出的，講解明白，使聽的人發生濃厚的興趣。他寫的文章也是一樣的，曉暢清晰，引人入勝，使人一開始閱讀，就非看完不可。

事，因為他們不但都是我志同道合的老友，而且都是博聞強記，造詣精湛的積學之士。我現在先把井塘兄一首錄在下面：

景瑚席上識謝扶雅先生，別後得見贈詩，賦公真高步超常倫，飄然渡海入國門，九十今充觀國賓，訪友訪勝去來頻，還往學府講微言，如撞晨鐘醒睡人，多謝主人春酒醇，少長咸集得識君，傾蓋真如故，半日獲良晤，握手各依依，緣慳相識遲，得詩讀若續相對，

知返高齋吟不廢，安樂窯中別有天，逍遙自在不計年，隔海相酬心俱歡，井塘兄把這首詩寄到我寓的時候，扶雅兄已離台飛美了。不久我也到了美國，順便把它帶給隱居維琴尼亞一鄉村的扶雅兄。他立刻回了我一封信，附了一首贈井塘兄的詩：

景瑚兄席上拜識余資政井塘先生，欣賦一律
詩翁同座喜無量，資政崇名太傅當，號聖稱仙今李杜，旣幽且默古東方，

各自稱爲「跛翁」和「盲叟」。實則井塘兄雖不能持久的站立不動，但絕對不是「跛」；他不但行路如常人，且能和朋友遊山玩水。扶雅兄的目光雖已衰退，但也不能說是「盲」。他平日看書及寫詩文都很敏捷；我恐怕許多年輕人還趕不上他的速度。事實上，兩老雖鍛健壯，思考力和反應力極強，都不像八十以上的老人。

可是扶老有一點重聽，也不能適應台灣的氣候，所以在旅居生活中，常常感覺不舒適。好在他寄居於台北市的國際青年活動中心，那裏有一位精明強幹而又充滿愛心和服務精神的狄克遜君，對他照拂看護，體貼入微。扶雅兄曾對我說：「他是我的醫生和護士，又替我做祕書，當傳譯。我一時一刻不能沒有他」。狄君是國立師大畢業的研究生，聰明活潑，多才多藝，而又態度和藹，彬彬有禮。

扶雅兄無論走到那裏，他必追隨到那裏。他以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而能對一位非親非故的老人，如此愛護，如此有耐性，真是我生平所未見。我認爲這是上蒼對扶雅兄的一種最仁慈的安排，我看見扶雅兄那麼熱愛自由中國的一切，勸他回國長住。他除衷心感謝政府及學術機關的盛情招待外，尤其覺得那位和他形影不離的狄君，對他幫助最多。他反問我說：「你能保證我下次來台，還有這樣的福氣嗎？」

四十餘年離亂後，觀光寶島喜相逢。
談心把臂悲往事，握手稱名憶舊容。
仰慕君身能事國，愧慚在下務歸農。
明朝踏上香江道，雲樹秋山又幾重。